

# 回忆参加红军长征

肖发文 （口 述）

古世培 熊强（整理）

我于1917年（民国6年）出生于威信扎西半林，母亲冯氏在本人生下三个月便离开了人间。后母熊元娣约1928年到肖家。父亲肖泽安，54年4月逝世。

八岁时我在本地黎寿昌所办私塾学习两年，了解《百家姓》的部分内容，并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以后中断学习，在附近祠堂租地10余亩耕种，又在当地背煤炭卖和到长官司（现旧城）帮人背纸求生。食宿艰苦，衣不蔽体，冬天四肢冰口到处可见。约在1932年，扎西居民谢光聪在簸箕坝帮吴么老板娘做活，我认识谢，并随同到吴家做工，谢光聪见我为人忠厚老实、勤劳，做工满意，便把女儿谢彩云嫁给我。以后爱人在家做活。我和父亲从吴家背酒到镇雄大湾子卖。父亲重朋友、讲义气。赚了点钱，常把老本吃得精光。由于付不起吴家利息，大年三十刚把肉煮好，吴老板便派人来把我抓走。第二天谢光聪知道此事，便一脚踢开吴家的门，强令吴家放了我。以后我和父亲商量，投靠谢光聪，住在林口任国安家（谢有一妹妹在林口），在此租地种植，年终收成很

好。第二年我背苞谷到四川两河换盐吃，回到半林便听人们说：“红军、共产党来了，朱毛厉害。”我就悄悄到树林里去看，路上行走很多人，相隔稍远而连成长线。有的背枪，有的背铺盖，有的背锅，看去非常疲倦。人们说见人就杀，我看不是这样。我跟其他人说，我要到扎西去看，人们阻拦我，我说我不怕，装成卖柴的进城，于是我和一个姓周的（具体名字记不清楚）一起背起柴到扎西，走到放哨处，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们说是卖柴的，他们说卖柴的可以去，我们把柴卖后他们还叫我们坐一会，他们说拿钱给你们不会用，干脆拿这个给你们，一看是大烟，每人两斤左右，以后又叫我们吃饭。吃完饭后，他们说你们不回去了，给我们推下磨，老周说他要回去，我说你去你就把我的烟一起带走。后来他们问我当不当红军，我问当红军做什么？他们说“打土豪分田地。”我想有地还不好？就说要当，以后就与他们一起走了，当时的情况是扩大红军三千几，浩浩荡荡四川行。

寒冷的冬天北风刺骨，泞泥的路甚似烂田一般，走了一天便到分水岭，插长坝、筑槽到贵州，出了筑槽便和敌人交战。我的枪太高，打到天上去了，老同志又叫我打矮点，矮点又打到土里去了，又叫我抬高点，对准敌人打，以后慢慢便学会了。吃饭除了当地缴的粮食以外，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后勤部备有白洋，可向当地老百姓购买，吃不完的就用袋子背上，打仗时为了轻装上阵，又用剪刀把袋子剪烂让米漏掉。一天，在贵阳附近与敌人激战，突然有一个手榴弹在我身旁爆炸，幸亏当时我是处于卧位而免于一死。到了娄山关，飞机一天来几次，老战士叫我戴上草圈，我才知道是作掩蔽

用的。第二早听说娄山关已攻下，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

生活虽然艰苦，但部队有严密的纪律。回想起来，革命能取得胜利，这和正义的战争、严密的纪律是分不开的。到了金沙江边，我想去砍根甘蔗吃，同志们便阻止了我，说不能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，我也就未动。渡金沙江是用竹杆编织成竹排渡过去的，打了邓锡侯部队后每人得一条军毡。记得当年爬一座大山，口很干，有钱也买不到水喝，许多同志差点因缺水而倒下，幸亏到了天泉，才使同志们得以解渴。休息一天多，用水碾碾米，准备干粮，翻越夹金山。当时连长说想法带点辣椒，我说刚才我看到一串挂起不敢拿，怕你们说，后来去找，无人在，放上几个白银便把辣椒拿走了。每人分几个，我问拿来做什么？连长说，明天就知道了。后来才知道夹金山氧气稀薄，人受不了，用辣椒嚼可减轻缺氧。当时我也顺利过去了，但仍然倒下了几个同志。过了夹金山，就遇到张国焘部队，互相骂着、开玩笑，但我听不懂。到了茛岭司藏民地区，准备20天干粮过草地。干粮主要是刮榆树皮烤干，搯成面，与青稞面混在一起。我得20斤左右，估计不够吃，又用白银跟藏民买上一点，结果藏民没要钱，送给我20斤豌豆。每次进餐都必须有命令，否则不能随便偷吃。下午出发，没多远就遇到草地，行走时必须照着草窝大的地方踩，否则会掉下去，有的人掉下去便无法爬起来。当时我的炒面打湿了，霉烂很凶，发出臭气，我只好吃豌豆，吃完豌豆就扯车前草吃，有时用藿麻煮来吃。有的得病没法医，加上饿，走起走起就倒下去死了，许多江西大汉就是这样死的。过草地时虽然战争较少，但饿死的人较

多。有的先遣侦察部队扔下的牛肚、牛骨头，已经发绿了，后面的人，由于没有吃的，放在水里面冲几下又弄来吃。

我们原是一军团，朱德同志带领。听说草地快要走完，但因又遇到了张国焘部队，于是我们又到了五军团，张不准前进，要南下四川，结果又倒回四川。第二次过草地回到阿坝甘孜，张国焘部队打天泉，我们打康定李焕兵部队（李的名字记不清）。雪山上风很大，不注意就被大风刮起走了。后来被李焕兵部队把我们部队打散，有的钻进深山老林，出来烤下火，用手搓下耳朵，耳朵就掉下来了。有次我由于太饿，又带点病，同志们把我抬到藏民的厕所里，还算命大，没有死，过几天就慢慢地好了。他们找点胡豆推成面面给我吃，以后也就随军前进了。

1936年，贺龙的部队来了，贺龙带二军团，肖克带六军团。我们的口号是“欢迎二六军，羊毛几千斤”，捐献羊毛给他们做衣服穿，当时还在甘孜，贺龙来后张国焘有些降不住贺龙，贺龙还是要求到陕北找毛泽东，于是又重新第三次过草地。有次我的干粮给马驮，我去检查另一个山的部队去了，口袋摩擦在岩上，岩石把口袋磨通，干粮漏掉许多，人家吃半碗，我只能吃一汤匙。此次还好，10多天就出了草地。到了腊子口，甘肃的陇西，有人告诉我们，快要过黄河了。

张国焘的部队是八八师，我们是三七一团、三九一团，四方面军是三〇军。八八师的武器较好，枪弹堆在河边，但敌人的工事是修好的，有几艘船到河中就沉下去了，我们的船到对岸不远就跳下来浮水，我不会，江西老乡就用手把我拉过去。过了黄河，到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县，此地气候比草

地剧烈得多。张国焘路线不对，兵力无法扩大，弹尽粮绝，突围跑了一个晚上，进了围子，工事还没有修好，马步方部队的骑兵就来了。天天如此，气候寒冷，水泼出去即冻成冰，有的呼吸时胡子也被冻成冰。在河西走廊来回和马步方部队周旋。整整一个冬天，九军团全被消灭，五军团只剩我们团的残部，动员地方人参军，人们思想动摇，不想在部队。说要参加，你们到苏联拿武器回来才参加。董正堂带骑兵团，当时我是排长，没有进高台。我们在山丹，山丹出城就是万里长城。一天，董正堂部队出去，马步方部队伏击在前面，下马与我们作战，下马就不如我们，我们把他们赶出长城。正月初一打下高台，董带了一个炸弹队，子弹打完了就用炸弹。以后马步方的部队又按回来，董军长在长城上喊：“让他们进来，进来后再收拾他们。”敌人听见不敢进来。敌人有个规定，缴了枪或俘虏一个军官，奖给多少钱。有个敌人背了七根枪，还想再检一根，我举起大刀，一刀就将这个人的头劈在地上，一个营只回去几个人，想起大家都掉泪。

以后我们到了富营，董军长带领两个团朝前打，此时正是1936年12月12日，打得正惨，听说西安捉到蒋介石，我们发电报到中央，要求把蒋介石杀掉。

6月1日，敌人反攻没有拿下高台，20日又打，打开了，血流成河，进去两个团，一个军部（后勤机关），2000多人，全部打死，董正堂牺牲。

从富营突围那天，离此40华里的高台炸弹响如芝麻，心想不能突围，因伤兵多，抱着我们的腿不要走，只好丢下突围，第二天接近30军，当时30军的政委是李先念，西路是徐

向前的总指挥，陈昌浩的总政委。总部组织两个骑兵师援救，沾不上边，到半路就被马步方部队阻断，我们的子弹打完，敌人来就往城墙上爬，用石块和砖打下来，有时将梯子打断。当时高台有个国民党的保安团，兵工厂制造炸弹的工人与部队同行，工人们被马步方部队活捉，虽未被残害，但说工人们的手是制造炸弹炸他们的，所以把工人们的手都给砍掉了。以后我们还是从富营突围出去了。比较激烈的一仗是杨家营，总部说，没有枪，石头也要拿一块，锄头也要拿上一把。李先念在此指挥，消灭了马步方部队3000多人。但马步方知道，九军、五军已没有了，只有我们三〇军的少部分人，以后我们往山里黑水寺大庙撤退，敌人从三方面来夹攻，但我们在上面，他们在下面，双方都死了不少人，以后我们便到了祁连山。

过祁连山，比过草地艰苦得多，除了冰河、冰山，就是沙漠，这是1937年2月份的事。五月份到了新疆，气候非常恶劣，刺草一下可把脚刺通，大腿、腰部到处可见冰口。部队打散后，中央通知徐向前、陈昌浩离开部队，否则将被敌人活捉。四川的一些妇女独立团被马步方部队活捉，带到青海，强嫁给马部队的军人，差点嫁给老百姓。到祁连山后，把部队编制成若干支队迷惑敌人，花了1000多大洋买了一批羊群，合并其它做成干粮，继续往西前进。马步方部队知道后又来骚扰，我们丢了一些羊肉继续走。有天，我遇到一个牦牛，去捉，未捉到，牦牛把我背了一里多路，最后下来左脚被刺了个大洞，差点赶不上部队。到安西，看到庄稼很好，但安西城已被马步方部队占领，总部下令攻打，我带头与李桂芳抬梯子上城墙，刚刚往前送，敌人一枪打在我

左侧口腔，牙齿被打掉。后来无法攻下又后撤退往西走。我们三〇军是张国焘的主力军，二六七团、二六八团到新疆是张的目的和主张。

我们走到安西城附近一条河边，看见一地主老财赶起马车朝前跑，我们想夜间行动肯定不是好人，于是打下来，一样用也没有，有的带了些金条、圆宝，到半路也甩掉了。晚上休息，到江家湾子，想可能再没有人追了，可刚躺下，骑兵又来了，两路将我们超（包）在中间。我们用沙包作掩护与敌人战斗，敌人用六〇炮打，我摸到身上是湿的，原来是伤口流的血。无奈横下一条心冲出去，敌人下马给我一刀，背上被砍破了大块皮，我还了一刀，当场打死，马跑了，敌人也退了。后来发现衣服全是湿的，原来是背上伤口流的血。敌人见我们人不多，团长又被打死了，便放声说：“你们上不了新疆了，投降吧，我们会给你们出路的！”我与一个江西人，是团政委，较年轻，他非常疲倦，行走困难，因我们是各部队组合的，也不熟悉他。我说：“我扶你走，有我就有你。”政委不同意，推我去阻击，我刚离开20步，政委就自杀了。听到枪响，跑回去看，政委已经死了。

我们剩下几个人，然而骑兵来了又要分散。一个晚上，我到一个小山坡，发现一幢房子，里面有灯光，有火。上前看，有几个人，不是敌人，是红军。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在扎西入伍时的班长，具体名字我不知道。他邀请我说：我们去找老百姓，当老百姓。我说不行，怕找不到被饿死。他说：“看我大腿上，内有大洋（钱）。”我说：“等我解个手（大小便）来商量。”这样我就走了，没有与此人接触。顺着沙漠走，又遇到一群人，是红军，共有七八十人。

选了个连长，仍向西边走。到了一个村庄，老百姓认为是马步芳部队来了，驮起粮食走。我们也认为是马步芳部队来了，又分散开来，以后遇到几个人仍然往西走。遇到有马站的地方，就坐下来歇一歇，喝点水，吃点干粮又开走。走了几天，人逐渐开始多起来。我们想可能快要到新疆了。听说有个盛世才，国民党督办与红军合作的，苏联领事馆在新疆。果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碉堡，抬头一看，上面架着一挺机枪。楼上有人问我们：“你们是什么部队，干什么的？否则开枪打死你们！”我们有些人也较大胆，说是朱毛部队，楼上的人没吭声，随后下来几个人，便是陈云、毛泽民他们。以后给我们换了衣服。非常荣幸，算是在临死关头有一个栖身之地。（待续）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

# 金凤滥泥坝激战

蓝澄清（回忆）

何沛魁（整理）

1935年2月，中央工农红军在威信扎西组成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。从此，纵队转战于云贵川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，历尽艰险，与敌人浴血奋战。1936年秋，纵队在经过上百次战斗之后，疲惫已极。决定把部队带领到威信、筠连、珙县三县交界的大雪山休整。总结过去的战斗经验，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。

为了拨除靠近大雪山的威信长安寺（今长安乡）和保洛坝（今麟凤乡）两个国民党乡公所，免除游击队在休整时前来骚扰捣乱，1935年10月的一天，游击纵队奉司令员刘复初命令，天未亮提前吃饭，踏着黎明前的黑暗，急行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干净利落连续打下长安寺和保洛坝两个敌人据点。

司令部侦察参谋况占云侦探得情报：滇军第二旅补充队第四、五、六中队，加上地方民团，约1000余人的兵力，在五中队长李浚源的指挥下，从镇雄县芒部、罗坎方向猛扑过来。这股敌人可能昨夜住宿威信县城，相距只有几十里。情

报还说，这股敌人与一般敌人不同，它的兵源不是强拉的壮丁组成的，而是龙云用高薪招募来的，属于龙云的精锐嫡系。士兵的素质条件比一般要好，有一定文化水平，身材高大，体格魁梧。经过严格检查挑选，合乎规格的才能录取任用。因此，士兵出身官门富家子弟居多，对红军非常仇恨敌对。而且，刚刚完成训练任务，听说打仗，个个跃跃欲试。指挥官李浚源，是龙云的心腹，为讨好主子欢心宠爱，邀功取胜心迫切。由于属龙云嫡系，武器装备精良，粮饷弹药充足，一个中队为欧三响，另两个中队为龙头马枪。两种枪均为德国造，龙云花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的。在当时国内武器库中，要算新式武器……

10月21日清晨，纵队来到大雪山附近的滥泥坝（今金凤村）。进驻滥泥坝时，纵队仍按“一三二”行军次序驻下。所谓“一三二”，就是三个大队的编次名称。为了保守军事机密，纵队行军时，经常变换行军次序，有时“一二三”，有时“三二一”，有时“二一三”。俨如一字长蛇阵。一大队驻筑槽沟（司令部与一大队同驻），好象伸向大雪山的一个龙头。三大队居中，驻滥泥坝。二大队为后卫，驻扎花秋坝。花秋坝背后是观音坡，地势高亢而险要，登高远眺，可将保洛坝及威信方向10多公里内景物尽收眼底，山坡两边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条小路从中间通过。二大队军事警戒哨就安设在这里，监视观察保洛坝和威信方向的敌情。

纵队进驻滥泥坝，在金凤杨成才（滇军营长、地主土豪）家驻下，一面煮饭，一面筹集粮草。纵队把杨成才、杨明三（长安乡团总）的粮食仓库打开，准备每个人带足八斤粮食，把各自的粮袋装满，以备进驻大雪山较长期食用。同

时，也备下一些油肉，携带进山供改善生活。当部队正在抓紧生火造饭和繁忙准备时，二大队军事警戒哨送来紧急情报，说滇军二旅补充队与地方民团，约千余人之众，已从保洛坝方向出动过来了。

滇军二旅补充队骄横跋扈，依据镇雄独立营通知，到保洛坝会剿纵队，路过威信县城时，却不停留，日夜兼程追了上来。到保洛坝时，又得到保洛坝区长周光汉飞报称纵队尚在滥泥坝，故马不停蹄，跑步前进，跟踪狂追。

司令员刘复初根据收到的情报，决定为了保存实力，避开敌人锋芒，暂不与战。认为只要纵队进入大雪山，这个遮天蔽地的原始森林区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也奈我不得。当即下令：仍按“一三二”为序，立即开拔，相互掩护，快速进入大雪山。命令下达后，刘复初率领一大队抢先占领韩婆岭，因为它是纵队进入大雪山必经的咽喉之地。准备在此掩护二三大队撤退。

正当部队行动时刻，敌人已经逼近。情况紧急已来不及请示报告。三大队队长刘少成和副大队长蓝澄清二人交换了意见，决定给这股骄狂凶恶的敌人，给以迎头痛击，把它的威风傲气打掉，以便摆脱尾追，才有利于进入休整。分析认为：敌人兼程赶路进军，已经疲惫已极，骄横则不警，已成强弩之末。而纵队是以逸待劳，应战取胜，希望很大。为了避免受到牵掣，迅速把队伍摆开。大队长刘少成率一中队抢占右翼铜马山；二中队队长倪九江率领二中队抢占左翼钻天坡；副大队长蓝澄清率领直属中队和炮排居中压阵，隐蔽于后山之上。摆下口袋阵，专等敌军前来自投罗网。

二大队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，与三大队新的作战部署

全然不知，仍执行司令部要他们掩护一三大队撤退的命令，拼死把攻击的敌人阻挡在袋形阵口——东皇殿脚下。敌人仗着人多势众，攻击的人数愈来愈多，从而加给二大队的压力愈来愈大，双方打的激烈残酷。战斗进行20多分钟，大队长余明盛（江西人）壮烈牺牲。敌人凭借数量上的优势，潮水般涌向二大队阵地，形势对二大队十分不利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埋伏在铜马山上的三大队长刘少成，眼见诱敌深入的计划已经不能实现，又见到二大队处境十分危急，便“冲啊”一声震撼山谷的怒吼声中，身先士卒，率领三大队一中队50多名勇士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杀奔下山来，冲入敌群，发起反攻，与敌人开展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。滇军与民团被纵队敢于近战的声威给吓呆了，阵地顿时大乱。二大队勇士愈战愈勇，敌军开始渐渐溃退。但敌军到底人多势众，经过一阵慌乱之后，在敌军军官逼迫督战之下，又从四面八方围抄上来。敌众我寡，眼看战场形势就要起变化，埋伏在钻天坡上的二中队战士，又顾虑长安寺方向敌人进击，纵队腹背受敌，不敢贸然下山增援。此时隐蔽在后山上的三大队副大队长蓝澄清，忙急下令炮排架炮，“轰轰轰”几发炮弹落在敌群中开花，敌人倒下一片。敌阵攻势大乱。有些士兵不顾长官的命令，拖着枪掉头就往后跑。敌人一时失去进攻能力。在韩婆岭上指挥战斗的刘复初司令员，瞭望得一清二楚，认为是脱离接触的大好时机，忙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。原来纵队与敌人斗智斗谋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使敌人摸不清纵队底细，故规定今天的号音，暗号是：吹冲锋号就撤退；听撤退就冲锋。部队闻听到冲锋暗号后，就停止了追击，有计划地相互掩护，有组织地撤退，敌人听

见纵队吹起冲锋号，还以为纵队大部队即将全力反击，但见部队后撤，本想追上来，又唯恐有诈，不敢轻易追击。刹那间，一个个象泥塑菩萨样在阵地上呆楞着，目送纵队一队队安全转移，进入大雪山。纵队在大雪山得天独厚的山峦叠嶂，参天古树，荆棘弥漫，雾雨迷濛自然条件的掩护和荫庇下，得以平静地喘息休整。

金凤滥泥坝一战，缴获敌人两挺重机枪，10多枝步枪，1000余发子弹。纵队牺牲二大队队长余明盛等八位同志，埋葬于东皇殿脚下桥头上。滇军第二旅补充队第五中队，死伤陈元学等30多人。为此，第五中队长李浚源应龙云召回昆明，挨了一顿训斥责骂后，被革除中队长职务。

（整理者附注：此文根据蓝澄清同志回忆材料整理而成。整理中，参照党史办雷吉常同志提供材料，在一些具体情节上作了订正。）

1990年10月24日写

1992年6月21日定

#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组织部 长戴元怀牺牲经过

晶 鑫（摘编）

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，组织部长戴元怀，江西省万载县人，童工出身。1928年参加革命。开初做青年工作，任青工部长，后到中央党校学习。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粤赣省委宣传部任部长。1932年，与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（李桂红）结婚。二人结为革命伴侣后，各自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，相互鼓励，努力工作。1934年，戴元怀调红军八军团任民运部长。戴元怀对党忠诚老实，工作积极，不管走到那里，都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他的模范行为，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。战斗中，哪里最艰苦、最危险，他就冲向哪里。在江西省会昌、高排、门冷等地作战中，由于机智勇敢，曾受过毛主席表扬嘉奖。

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遵义。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，会议精神传达后，全党全军无不欢欣鼓舞。但八军团在长征途中，由于战斗频繁艰苦，损失重大，人员所剩无几。担任民运部长的戴元怀，在极其艰苦的行军作战中，衣服破烂，面容苍老，仍满怀革命胜利信心，对李桂英说：“现在

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，革命一定会胜利！……”

1935年2月，红军长征进驻扎西。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。三军团向中央汇报了叙永特区游击队的情况。中央决定：抽调部份红军干部留下组建地方游击队，打击和牵制敌人，掩护与配合中央红军北上。抽调徐策、余泽鸿、戴元怀等人，组成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区委员会（先为中共川南特区委员会）。戴元怀任组织部长。抽调红军干部战士100多人，留下地方组成“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”（先为川南游击纵队）。戴元怀的爱人李桂英也被抽调留下参加游击纵队。李桂英调任游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，开始思想有些不愉悦，成天闭着嘴不讲话，缄默其口。戴元怀见状，耐心启发帮助，说：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党叫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战斗，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！”又说：“斗争愈是艰苦，愈要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”自此以后，李桂英精神振奋，愉快地同大家一起战斗。从此，戴元怀随从纵队以威信为中心，南征北战，驰骋在云贵川三省边区20多县地，开展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的游击区。

1935年3月下旬，红军游击纵队西进四川珙县周家沟。敌人以为纵队要奔袭四川长宁县城，急令长宁县民团转回阻截。而纵队却突然转头南下，经四川珙县、兴文边界，3月24日进抵四川珙县大石盘山，宿营于观音岭下的新佛寺、瓦匠坪、园石板、学堂湾、大田坝一带。纵队估计已甩掉敌人，准备在山上休整。3月25日，不料川军黄锦章团及四川兴文、长宁、古宋、江安四县民团跟踪追来，连夜赶到大石盘山下，对纵队形成包围圈。26日拂晓，对纵队发起总攻

击。黄锦章由当地民团带路，抄捷路从瓦匠坪上山，悄悄摸掉岗哨，逼近纵队驻地。纵队遭到黄锦章团的突然袭击，仓促被迫应战，边打边撤，战斗十分激烈。由于事前没有应变准备与部署，只得临时仓促向观音山上转移撤退。欲从观音井、小垭口转移回到云南威信。由纵队第五大队担任阻击，掩护司令部。四川江安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李品三，随黄锦章团吴××营扑上山来，觑见纵队转移撤走，他们熟悉这一带地形，分兵一股从捷径抢占观音井、小垭口，据险扼守要隘。居高临下，以密集的火力俯射下来，封锁纵队去云南威信的通道。纵队刚转移来到观音井，就与敌人遭遇，被敌人堵住去路，战斗异常残酷激烈。后面的追敌，又紧追不舍。纵队腹背受敌。经过反复勇猛冲击，仍不能打通去云南方向的道路，处境十分危急。

在部队濒于全军覆没的严重时刻，组织部长戴元怀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挺身而出，带领司令部通讯班10多名战士，用短枪阻击包围拢来的敌人，吸引敌人的火力，与敌人浴血奋战。掩护主力突围穿过观音岭的大片竹林，钻进大雾笼罩的观音井山顶，绕道从新庄垮水竹林下鸡板山，进入威信境地。戴元怀和通讯班10多名战士，坚持阻击蜂涌追来的敌人，前仆后继，异常惨烈，阵地变成一片火海，但坚守阵地，挡住敌人追击的胜利信心，仍坚如磐石。实足以昭示我游击队员慷慨赴死的精神，与杀身成仁的决心。此次突围战斗中，纵队伤亡很大。戴元怀与通讯班10多名战士，全部壮烈牺牲，以身殉国。李桂英撤退时，瞭望到爱人戴元怀身中枪弹倒下，出于义愤与情感，要冒枪林弹雨的危险，拼死冲回去抢救，被战士强拖硬拉了回来。纵队撤走后，丧心病狂

的李品三，竟剥光烈士的衣服，砍下头颅，背运到珙县石碑、建武等乡镇，悬挂示众。借以恐吓群众，并向主子邀功请赏。

1938年，李桂英从重庆出狱后，辗转到汉口长江局。把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坚持斗争的经过，和干部战士英勇斗争的精神，以及纵队最后失败等情况，向组织作了全面汇报。邓颖超同志听了后，感动说：“战斗频繁，扎不下去，拖得太厉害了……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永存，将鼓舞人民继续前进！”

青山有幸埋忠骨。戴元怀虽然为党为革命牺牲50多年了，但他的崇高英雄形像，光辉的革命事迹，将永远留在川滇黔人民心中，一代代传颂下去！

（本文的写成，根据李桂英、张固恒、雷吉常等同志提供材料摘编而成。特此鸣谢！）

1990年10月19日写成

1992年6月24日改定